

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

王启涛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杭州 310028)

摘要:古代吐鲁番是多元文化汇聚的地区。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婆”(粟特语词,意思是长子)、“天”(佛教天神以及佛教化的其他天神)、“圣道”(对僧人的敬称)、“丘承、左神”(阴间神将副职)、“墓伯、土伯、土公”(墓地之神)、“赤娥”(红色大蚁)意义的考证,可以揭示这一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同时,应倡议沿着陈寅恪、罗常培等前辈学者的足迹,将语言与文化互证。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6)06-0103-06

【婆】

伯、兄、长子。73TAM517:04/3(a)高昌元礼等传供食帐(四)(1—266):“次传[]婆演,麴郎[]校尉传。”72TAM150:46唐翟建折等杂器物帐(3—28)^①:“康婆德打一,曹不之拟打一。”72TAM151:64高昌供用权、等物条记(2—111):“康奴得鹿修,李[]南刘都寺权,车婆这权。”86TAM389:21-2a唐西州某乡车牛并夫簿(柳87)^②:“羊伯善车牛付苻鼠堆,赵婆演?子车牛。”60TAM329:23/1,23/2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一)(1—461):“次虎牙元治传,[]婆演大官别迴尽。”^③

根据王素先生的统计^④,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中涉及“婆”的还有:高婆(5/277等,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共出现了15次)^⑤、康婆(3/319)、康婆解盆(7/741)、康婆居落(3/27)、康婆颀骑知(3/119)、龙阿婆奴(3/162)、王婆(5/301)、王阿婆奴(2/

331)、苏婆(5/288等,共出现6次)、张婆(5/277等,共出现11次)、张阿婆奴(5/137)张阿婆相(3/216)、孙婆(5/297等,共出现3次)、范婆伦(3/35)、范婆奴(10/83)、弥举阿婆(6/161)、住儿阿婆(6/161)、射勿牛婆(5/326)、安阿婆(8/417)、婆护(9/13)、婆头(3/100)、婆延潘(3/37)、婆子(7/429)、婆致(5/153)、婆德(6/55)、婆演(2/286)、婆祝(5/206)、婆颀毗(2/286)、婆彭(2/286)、杨婆(5/277等,共出现14次);欢阿婆(6/162)、成阿婆奴(5/5)、丰仁阿婆(6/162)、曹婆(9/13)、田婆泰(3/245)、田婆落居(5/7)、晖阿婆(6/161)、匡阿婆意(5/45)、举阿婆(6/162)。

以上人名中的“婆”究竟是何义?如果用常见的意义相比附,根本对不上号。我们认为,这个“婆”其实是粟特文 *prtm* 或 *Pərtam* 的音译,其意义是“伯”、“长”、“长子”之义。请试论之。

首先,从古人名与字之关系求之。考洛阳邙山

收稿日期:2006-05-01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研究》(04CYY005)、国家古委会项目《吐鲁番出土文献导论》(0459)、中国博士后科学技术基金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词汇研究》(2003034069)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撰写中,承蒙业师张涌泉教授、董志翘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王启涛(1965—),男,四川仪陇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学、汉语文字学研究。

出土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大唐故洛阳康大农墓铭》：“君讳婆，字季大。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苗裔也。”^⑥“婆”与“大”，名与字对应非常明显。而北朝隋唐的萨保中也有名“翟婆”者^⑦。又考敦煌文书P.3813《文明判集》第114-126行载有“长安县人史婆陀”，而下文又载此人“有亲弟頔利”。则“史婆陀”为史家长子明矣。

其次，从胡人的姓名文化可以考知。敦煌写本P.5034《沙洲都督府图经》载有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及其弟地舍拔之事，日本学者羽田亨将“拂耽延”与持摩尼经入唐的波斯人拂多延(Furs-todan即知教义者)比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1957年，第401-402页)。当代粟特语学者已经指出羽田亨的错误，并指出“拂耽延”应被还原为Pərtam-yan(荣新江先生标为prtmy'n)，意思是第一件礼物。作为地拔之兄，“拂耽延”取名字有“头胎仔”之意，是更合乎逻辑的^⑧。现在我们正可以将“拂耽延”(Pərtam-yan)与“婆延”相比较。则“婆”之“长”、“伯”义明矣。

再次，从胡人与汉人的姓名还可以找到旁证。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有一个习惯：在自己的名字中标明自己的出身排行。汉语的“伯仲叔季”就是一个典型。《仪礼·士冠礼》：“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郑玄注：“伯、仲、叔、季，长幼之称。”班固《白虎通·姓名》：“以时长幼，号曰伯仲叔季也。伯者，子最长，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其姓名都体现了这一点。标明长子身份的有史阿伯仁(6/243)、汜阿伯(3/48)、汜阿老儿(3/107)、韩伯(2/11)、韩伯轮(10/183)、杨大(5/288)、汜父师(6/25)、李老(5/289)、范老子(10/65，14次)、赵伯(6/425)、赵伯怀(5/44)、成大(5/282)曹大(5/277等，共出现13次)、田阿伯儿(3/218)、田阿父师(4/21)、员延伯(4补/50)、孙阿父师(5/74)、孙阿父师子(6/371、6/384)孙父师子(6/54)、孟大(5/289等，共出现3次)、孟老(5/308)。翟伯儿(4/173)何父师(7/173)、龙伯晕(4/54)、龙大洛(7/396)、高元定(10/242)、高一(5/288)、王伯伦(10/97)、王老(5/277等，共出现16次)、夏伯住(6/497)、贾大(5/301)、贾阿先(6/49)、张头子(3/150)、张延大(7/382)、张伯(6/121)、孙大(5/280)、孙阿父师(5/74)、孙阿父师子(6/371、6/384)、康阿

伯(5/207)、庆伯(3/46)。而体现排行老二以及更后面的名字有这样一些：赵二(5/277等，共出现15次)、赵三(5/288等，共出现8次)、史尾鼠(5/206)、范小奴(9/101)、宋尾奴(3/98)、浑小弟(8/57)、孟八郎(5/305)高五(8/503)、高仲琮(2/331)、高四(5/277)、郭二(5/277)三奴(5/279)、三胜(8/74)、王六(5/277)、王二(5/277)、王五才(4/258)、王仲佰(3/35)、张二(5/277等，15次)、张五(5/288等，8次、张小奴(3/37、8/257)^⑨。

值得注意的是，“婆”这一词语不只是用于昭武九姓胡人名字中，也用于一些汉人姓名中，从“孙婆”“张婆”这些名字可以看出，当地汉人胡化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所以，通过西域地区胡人和汉人姓名的研究，非常有助于考察高昌地区的文化交流。前辈学者陈寅恪、罗常培先生曾大力倡导这一方面的研究^⑩，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⑪。

【天】

天神。主要是佛教天神以及佛教化的其他天神(包括袄教等)。69TKM33:1/7(a),1/10(a)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二)(1-239):“三斗供祀诸天。”69TKM33:1/3(a),1/6(a)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三)(1-240):“□传,面六斗供祀天。”64TAM29:44之六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3-339):“作更于绢V生画两捕,释迦牟尼变,并侍者、诸天,每年赵法师请百僧七日设供。”又:1965年吐鲁番安乐城废佛塔中出土《金光明经》卷二题记(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图84):“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山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讫竟。”67TAM88:25高昌高乾秀等每亩入供帐(二)0(1-200):“九月七日,二□□供作希瑾信,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付阿□□祀胡天。”73TAM524:34(A)高昌章和五年(535年)取牛羊供祀帐(1-132):“章和五年乙卯岁正月□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次三月十一日,取胡未驹羊一口,供祀风伯。次取麴孟顺羊一口,供祀树石。次三月廿四日,康祈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五月廿八日,取白姚(溷:浑堂)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取孟阿石一口,供祀大坞阿摩,次七月十四日,取康西儿牛一头,供谷里祀。”

按: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天”的真实含义,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认为是祆教之天神^①,又有学者认为是大自然之天^②。我们有不同意见,我们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天”进行了穷尽式考察,发现只有一个意义:佛教的天神以及佛教化的其他天神(包括祆教天神)^③,今试论之。

首先,佛教本来就有天神。近人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1991年,第463页)“天”字条:“又不拘其住处,指一切之鬼神,名为天。如鬼子母神谓之鬼母天。”又“天神”条:“梵语曰泥缚多 Devata,为梵天、帝释等一切天众之总称。《无量寿经下》曰:‘如是众恶,天神记识。’吐鲁番出土文书64TAM29:44之六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3—339):‘作更于绢V生画两捕,释迦牟尼变,并侍者、诸天,每年赵法师请百僧七日设供。’请看下文紧接着便言:‘于后更向堀门里北畔新塔厅上佛堂中东壁上,泥素弥勒上生变,并菩萨、侍者、天神等一捕,亦请记录。’^④此件文书中的“诸天”与“天神”遥相呼应,无疑说的是佛教诸位天神。又请比较近人在硕尔楚克(Shortchouq)发现的、用焉耆语(吐火罗语甲种方言)写成的有关焉耆(Agni)国王Indrarjuna偕同王后Suryaprabha延请众神之词。所请者为弥勒暨诸天神,比如梵天、帝释、诸乾闥婆军主、鸠槃荼、龙、夜叉等。言愿焉耆诸王自去世至Candarjuna以下皆得善生^⑤。焉耆与龟兹等国也有弥勒信仰,而且对高昌的佛教影响甚大,沮渠蒙逊的弟弟就喜弥勒,并以译经名于当时,在哈那和卓有碑证明沮渠氏奉弥勒。以上文献正可旁证“诸天”为佛教诸天神无疑。

其次,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丁谷天”只能是丁谷寺的天神。丁谷寺是非常有名的佛教寺院,广泛见于吐鲁番文书,如81SAT:2吐峪沟出土《西州乘牛帖》、69TAM117:57/6《高昌午岁张阿欢上丁谷寺举价粟条记》、72TAM151:102、103《高昌作头张庆祐等偷丁谷寺物凭钱帐》等。丁谷寺就是吐峪沟,这一点已经被中外学者所论证^⑥。吐峪沟至今还有高昌国时期石窟中的数幅禅观壁画,而敦煌石室所出P.2009《西州图经》亦称“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事实上,早在高昌国时期,丁谷窟就成为了重要的禅修基地。特别是弥勒、弥陀、十方净土信仰并存,而且,在丁谷寺等地还有小乘佛教信仰,饶

宗颐先生认为“丁谷天”即在丁谷之祆教祠^⑦,张广达先生认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丁谷天“是当时吐鲁番地区重要的祭祀胡天的地点之一”,“似乎应在丁谷寺附近”,恐均误。“丁谷天”只能理解为是佛教寺院丁谷寺的天神。

但是,必须指出,包括丁谷寺在内的高昌佛寺,确实也可能供奉着祆教等各类天神^⑧。或者说,高昌的佛教神祇中也包括了祆教等各类天神。这一方面是因为高昌佛教的世俗化特质所决定,另一方面是因为祆教来到此地,必须依附佛教以生存与发展。所以祆教天神必须依附于佛教。高昌国佛教深受中国北方汉传佛教的影响,杂糅了许多民间信仰。它对佛教以外的某些偶像和神祇并不排斥。对祆教天神也不例外,高昌佛教体现了高度的世俗化^⑨,所以,在丁谷寺这样的佛教寺院里供奉有祆教天神毫不奇怪。在当时的高昌地区,也如同中国广大地域一样,一切天神,都是护卫佛法,祆教天神更是如此,这有明文记载。考董道《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像”条:“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异,即经所摩醯首罗,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摄伏四方,以卫佛法。当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张广达认为胡天信仰与佛教信仰同时存在于高昌^⑩,我们则认为更多的是祆教的佛化^⑪。另外,学者们还注意到:粟特祆教美术盛行于佛教重镇于阗地区,并以木板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图像的特征,既可以看作是祆教的,也可以看作是佛教的。其中,阿胡拉·马兹达(Ohrmazd)和佛教图谱中的帝释天(Indra)相似,风神(Weshparkar)和大天(Mahadeva)或湿婆(Siva)的特征相对应,四臂的娜娜女神(Nana)也可以找到印度的类似图像。在佛教眼中,这些祆教形象无异于佛像^⑫。荣新江指出:“任何一个宗教图像刚刚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总是会被误读的,就像佛教在汉代进入中国后,浮屠的形象是借助黄老的形象而传播的,敦煌白画祆教图本发现在佛教石窟当中,似乎也透露出这幅画后来已被看作是佛教图像。可以说,在粟特祆教美术东渐过程中,一些祆教图像的宗教功能逐渐转换,从祆神变成了佛像,或者说是被看称佛像了。”^⑬

【圣道】

对僧人的敬称。64TAM15:23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张某夏田契(2—25):“渠破水过,仰耕田人承了。要迳丑岁壹年用种。风□□壹车。治渠

圣道张□成之后,各不得返□□私要,々行二□。”请比较 OR8212/548Ast, vi. 2. 010dv 北凉用水文书(沙 89):“□逞(?)白道人县□□□近日水值多溢□□□□纳二亩。”又比较“圣僧”。佛教称已成正果的高僧。66TAM44:30/3 唐残发愿文(3—72):“谨于今时□□无□上福田,入理圣僧文现□□□为法界众生预仏□。”唐白居易《游悟真寺》诗:“经成好圣僧,弟子名扬难。”

【丘承】【墓伯】【土伯】【土公】【左神】

“丘承”就是丘丞,墓丞,墓丞相,阴间神将副职;“墓伯”就是墓地之神。土神就是土地之神。土公也是土地神。左神就是“佐神”,也是神将副职。73TAM506:05/2(a)唐大历四年(公元 769 年)张无价买阴宅地契(4—395):“丘承墓伯,封步累畔。道路将军,整齐阡陌。”60TAM332:6/2-2(A),6/2-1(A)唐祭祀土伯神文残片(3—156):“今书名字,付土伯神,往愿良时好日,告誓诸神。”又:“方土伯之神,其□。”60TAM332:6/1—1(A),6/1-2(A),6/1-3(A)唐写本《五土解》(3—152):“谨启西方白帝土公驾白车,乘白龙,白公曹。”73TAM518:2/2(B)唐醮辞(3—467):“□神,愿为禁摄,莫使犯人。生死路别,不得相因。今书名字,付上左神,速摄囚。主人再拜,酌酒行觞,敢告上方,照垂神。”

“丘”即“墓”。《方言》卷十三:“冢,自关而东谓之丘,小者谓之塿,大者谓之丘。”《周礼·春官·冢人》:“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郑玄注:“王公曰丘,诸臣曰封。”《吕氏春秋·孟冬》:“飭伤纪,辨衣裳,审棺槨之厚薄,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高诱注:“丘,坟。”“丞”与“承”通。《集韵·蒸韵》:“承,承阳,县名。在长沙,或作丞。”考《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孔颖达疏:“《尚书大传》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又考《广韵·蒸韵》:“丞,佐也。”请比较日本中村不折藏汉代永和六年瓮中有今隶文字如右:“坟墓东□□□□□□□□□□墓伯、墓丞相墓□堵□□□□所□者市曹主人□□□今日吉日解五□□杀及与中央□□□□天帝使者告□□□□墓门亭长主□□□□到丞召作行差□□□。”又有永寿二年二月瓮上文字:“天帝使者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今成氏之家死者字桃推死日时重复年命与家

中生人相拘籍到复其年命削重复之文解拘伍之籍死生异簿千秋万岁不得复相求索急急如律令。”又有熹平四年瓮文(文字带率易的八分书,稍带隶体):“熹平四年十二月□(甲)□(午)□(朔)三日丙申天帝日止移封镇定邑里死人□□台冢墓移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上墓下中央大□墓左墓右云门蔡酒蒿里父老令胥文台家子孙□(后)世无□复有死者上天仓仓地下芒芒死人归阴生人归阳。”又同书载太康三年瓮(洛阳出土)文:“死者得行莹将军□鬼备守丘丞墓伯藉鬼多归地下。”²⁹又请比较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出土元嘉十六年买地券:“中央墓主,丘丞墓伯,冢中二千石。”³⁰

墓伯即墓地之神,可能即土伯。《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觶觶些。”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约,屈也。觶觶,犹犴,角利貌也。言地有土伯,执卫门户,其身九屈,有角觶觶,主触害人也。”又:“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胡文英曰:“土伯,守幽都者,犹云鬼伯也。”周拱辰言:“土伯,土神也。其神牛身,土属牛也。犹东方木神为勾芒,其神龙身,西方金神为蓐收,其神虎身是也。”1978 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根据发掘报告,言其主棺的棺画,有“持双戈同秘或双戈戟的神兽像,当是用来表示守卫的武士。”(《文物》1979 年第 7 期)。汤炳正先生将所绘神兽像与《楚辞·招魂》之“土伯”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实即同一事。并指出:“土伯,地府守门神,曾侯乙墓主棺棺画有众多守墓神兽持戈戟图像,可参。”³¹

土公就是土神。汉王符《潜夫论·巫列》:“土公、飞尸、咎魅、北君、衔聚、当路,直符七神,及民间缮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当惮也。”《太平御览》卷三七引三国吴裴玄《新言》:“俗间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动。”

通过对吐鲁番出土的祭神文书的词语进行考证,我们发现高昌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内地关系非常密切。

【赤娥】

赤娥,传说中的赤色大蚁。60TAM332:9/1—1 唐祭五方神文残片一(3—154):“□□西方白帝,白□□兽白虎□神威振怒,赤娥若鸟,玄畜无所犯。”

《山海经·海内北经》：“大其状如螽，朱蛾其状如蛾。”晋郭璞注引《楚辞》作“玄蜂如壶，赤蛾如象。”考《楚辞·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

外旷宇些。”“赤螳若象，玄若壶些。”又宋梅尧臣《赤蚁辞送杨叔武广南诏安》诗：“南方赤蚁大若象，潜荒穴洞人莫逢。”均其证^⑩。

注释：

- ①“(3-28)”表明此件文书图片载于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8页。下面依次类推，不再出注。
- ②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文书图片，我们标明了出处。“柳87”表明该文书图片见于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 ③“演”可能与“延”同，都是粟特文y'n的音译，意思是“礼物”，兼有“荣典”、“庇护”义。在穆格山文书中，以y'n和pm为后缀的人名，是最通行的粟特男名。参考里夫什茨《穆格山出土法律文书》，莫斯科，1962年，第47页，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39-40页。
- ④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 ⑤“5/277”表示此件文书出现在唐长孺主编录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第277页。下依次类推。
- ⑥《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图板126；录文参考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 ⑦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
- ⑧韦伯《粟特人名考》，《印度日耳曼研究》（Weber, Zur Sogdischen Personennamenforschung,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第77卷第2-3期，1972年，第199-201页；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156-171页；蒲立本《内蒙古的粟特聚落》，《通报》第41卷（E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Vol.41, 1952年，第333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40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页。
- ⑨从以上名字还可以看出，在“伯”、“老”、“父”等表示长子的词语的前面往往有表示尊称的前缀“阿”，而不表示“长子”的排行名称中往往没有“阿”。恰好，“婆”前面经常出现“阿”，亦可证“婆”有“长子”义。关于“阿”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表示“尊敬”意义，可以参考拙著《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阿”字条，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页。
- ⑩陈寅恪《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指出：“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凡入居中国之胡人及汉人之染胡化者，兼有本来之胡名及雅译之汉名。如北朝之宇文泰，《周书》《北史》俱称其字谓黑獭，而《梁书·兰钦王僧辩侯景诸传》，均目为黑泰，可知‘泰’即胡语‘獭’之对音，亦即黑獭之雅译汉名，并非其字也。由此推之，胡化汉人高欢，史称其字为贺六浑，其实‘欢’乃胡语‘浑’之对音，亦及‘贺六浑’之雅译汉名，而‘贺六浑’则本其胡名，并非其字也。”（《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4页）罗常培先生更从六个方面论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六个方面就是：第一，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追溯过去文化的遗迹；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 ⑪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胡人姓名中还有“破”。我们认为其意义可能通“婆”，都是“长兄”、“长子”义。73TAM514:2/1-2/4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一）（1-450）：“次廿二日，曹破延买肉沙五十斤，同四十一斤。”67TAM78:17(b), 18(b), 19(b), 28(b)唐贞观某年孙承等户家口籍（2-49）：“破延老，丁男老妻寡妻宋资台、索居胜。”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有曹破延（3/120），何破延（3/319-321）史乌破延（6/479），康乌破延（7/389）。“婆”在上古属于并母、歌部，读为bua，在《广韵》中属于薄坡切，并母戈韵合口一等平声果摄，读为bu，而“破”上古属于滂母歌部，p'ua，《广韵》属于普过切，滂过合一去果（拟音参考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5-26页），所以相通。
- ⑫可以参考王素《高昌火祇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地区宗教的踪迹》，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祇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年，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第472-509页。
- ⑬林悟殊认为是对天体的自然崇拜，参考氏著《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 ⑭姜伯勤先生认为,高昌“胡天”有二义:一指袄教,一指袄祠(参考姜伯勤《中国袄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76 页)我们认为,“胡天”只有一义,即“胡天神”。
- ⑮请比较 S.367《沙洲伊州地志》伊州条记:“火袄庙中有素书(画)形象无数。有袄主翟槃陀者。”
- ⑯(法)谢阁兰、伯希和等著《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92 页。
- ⑰详见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 1-17 页。
- ⑱饶宗颐《穆护歌考》,《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第 404-441 页。
- ⑲如德国考察对在吐峪沟找到带状墙饰,上面的圆徽型纹饰中绘有野猪头像,这可能是袄教信仰中的胜利军神 Verthragna。参考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 1-17 页。
- ⑳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57 页。
- ㉑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 1-17 页。
- ㉒又比如,金刚力士属于佛教的护法神,从巴楚、龟兹、焉耆到高昌都能找到他们的踪影。然而,金刚力士最重要的特征是头戴狮头冠,这种头冠来自犍陀罗佛教艺术。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印度佛教思想与希腊罗马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犍陀罗艺术中各类佛教神祇的造像,绝大部分借用了希腊罗马古代众神的外形。典型例子就是佛的形象就是借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的外形创造的,其他佛教诸神也多以希腊为模特,早期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夜叉和金刚力士曾借用过希腊海神波塞东和智慧之神阿西娜的外形,后来借用了更有威力的希腊罗马崇拜的大神赫拉克劳斯。参考霍旭初《高昌石窟金刚力士考略》,载《吐鲁番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又比如,在敦煌莫高窟第 285 号洞窟里,东西方诸神汇聚一窟。既有印度的湿婆,又有中国道教的羽人,既有希腊神话中的月神狄安娜,又有中国神话中的女娲。参考中央电视台出品电视记录片《张骞通西域》,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2006 年出版。关于敦煌吐鲁番的各类天神崇拜,还可以参考拙著《吐鲁番学》,巴蜀书社 2004 年,第 211-212 页。
- ㉓参考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323 页。
- ㉔伯希和《高昌新兴令麴斌芝造寺施入记》载高昌国“像庙星罗,僧檐云布。”(录文根据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三上次男博士喜寿纪念论文集·历史编》,平凡社,1985 年,第 114 页)其中的“檐”,其实就是檐,或阿檐。本为胡神。S.367《沙洲伊州地志》伊州条:“柔远镇,隋大业十二年置伊吾郡,因置此镇,其州下立庙,神名阿檐。”而此处与“僧”连在一起相提并论。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康寺”“史寺”两个粟特家寺,郭平梁认为是袄寺(见氏著《魏晋南北朝时期车师——高昌一带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新疆文物》1988 年第 3 期),但是荣新江认为“与其他同类家寺合在一起考虑,他们更有可能是佛寺。”荣新江是对的。参考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46 页。姚崇新认为,胡天是官祭诸神之一,寺院及普通百姓须向官府纳物助祭。参考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80 页。
- ㉕录文依据(日)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李德范译,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2 页、第 4 页、第 8 页、第 34 页。
- ㉖正面及左侧文字摹本参考黄义军等《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载《文物》2005 年第 10 期。
- ㉗参考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 1984 年版,第 270 页;李大明等主编《楚辞集校集释》,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60-2161 页。
- ㉘关于前贤时彦对于“赤娥”的诠释,详细情况可以参考李大明等主编《楚辞集校集释》,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51 页。

Lexical Semantic Explanation of Tulufan Unearthed Document

WANG Qi-tao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Ancient Tulufan is a convergence point of cultural diversity, which is proven by a lexical seman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unearthed docu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dvisable to compar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manner of Chen Yinke and Luo Changpei.

Key words: Tulufan; unearthed document; lexical explanation

[责任编辑:李大明]